

第十章 虎之门(二)(大东亚省)

看不见的大东亚省

在此，还须谈谈大东亚省的情况。

前面说过，外务省与大东亚省都在虎之门。大东亚省成立于1942年11月。那时，太平洋战争的军事行动一帆风顺，对南方各地的控制也达到了预定的设想。但仅靠军事的成功是难以持久的，所以决定投入文官与民间人士，按正常的政策步调来进行，以确保占领地的民生。在陆军的倡议下，大东亚省因此而成立。但就具体事务而言，大东亚省与外务省大同小异，因而它的成立确属叠床架屋之举；况且，它的出现在国内民众中虽然印象尚可，然在外，则易给人一种是以日本统治南方各地的殖民地省之感，所以当时的东乡外相对此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而结果，东条首相则强行成立之，这是东乡辞去东条内阁外相的理由之一。这个机关的来历是经过一番周折的。

大东亚省是干什么的呢？当时一般的国民也不甚了解。但作为行政机构，成立了就成立了，其职能是可以随意变动的，大东亚省的职能也出乎意料地完全向别的方面转化，这就有了其存在的理由。在外相兼任这个省的大臣时，次官就是这个省的主人了。我们先听听终战时大东亚省的次官田尻爱义氏的谈话：“大东亚省究竟是干啥的？时常有人这么问。因为我是在1945年5月13日任次官的，这时已近尾声，所以我的工作似乎就是处理善后事宜，原来要做的事并未做。原来的事也干不了，所以最后干的全是别的事。大东亚省的工作，原本是指导在东南亚的日本制造的独立

国，如缅甸、菲律宾等国的内政的，而实际上只是把军事占领时期的军政全部接收过来，大权在握，进行任意指导。在此意义上，大东亚省是随着军事行动的，是个隐藏着的存在。而且大东亚省没有外交权，所以又离不开外务省，例如，就是东南亚各国元首在东京举行的大东亚会议（1943年11月5日），也是以外务省为主角的。因此，就实际情况而言，正如在当地不做军队那样过于严酷的工作一样，大东亚省只接受加减法般的简单的任务。

对此，我有亲身的体会。我是在1944年4月19日以公使的身份奉命到马尼拉去的，在此之前，我在上海做公使。那时南京政府的威信扫地，这样下去将丧失中国的民心，所以必须想方设法解决这一问题。我认为换下南京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汪精卫为好，而且那时汪先生的身体也已经垮了。我的这些行为触动了东条先生，所以被流放到菲律宾去。当时，在马尼拉，大使是村田省藏先生。村田先生是我在一桥大学的上几届同学，年轻时候就一直研究中国问题，我在成为外交官后也几乎都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两人很熟悉。行前，我在上海曾与村田先生进行了联系。他说：‘你来也没用。这里的工作就是限制军队的随意行动，这些工作我做做已够了，你就别来了。’于是，我谈了我与东条的关系，以及东条甚至要取消外务省的种种猜测。于是他表示：‘那样的话，你来也可以。’

一到马尼拉，觉得情况很严重。我先和劳雷尔总统一起进餐，听听他的不满。总统牢骚满腹，他这么说：‘我们确实是在日军帮助下独立的，对此我衷心地感激你们。但是，虽然让我们独立了，却不知独立后你们军队究竟要怎么办？我们的事什么都要干涉！现在我们的力量很小，但军队一直这么干的话，待我们有了力量就一定要报仇！’表现了拍案切齿的愤慨情绪！这只是其中一例。我想这样的情况在各地都程度不同的存在吧。

由此可见，表面上虽有大东亚省存在，实际上什么积极的事也干不了。只见军队，不见大东亚省的存在，这就是大东亚省的

实际情况。更何况大使们性格各异，村田本人也只能想方设法安慰劳雷尔总统，但这只是安慰，这样总要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村田要我返日，将此地的实情转告于本省的同行（因这里无实际工作可干，有时回去也无妨），于是我回到了日本。

恰于此时，南京政府的汪先生病情恶化，来日本名古屋治疗。我想汪先生没指望了，希望能取得汪先生的记录。或许是我旧习未改、且又有时间，就四处活动。但这却激起外相重光的愤怒，于是我又回到了马尼拉。

美军在莱特湾登陆时（1944年10月20日），村田大使匆匆回来，似乎要干什么，实际上是好不容易才保住性命，逃回了此岛，确实是九死一生。我们再次回到了东京。由于这次并非奉命回国，所以几乎被目为临阵脱逃的惯犯，外务省没给好脸色。明知我们在东京，重光也不召见。当我觉得已无机会的时候，加濑俊一秘书官来了，他对我说：‘不管怎样，你们总要去见见大臣，也许有什么事要交待。若那样，希望你们毫无怨言地承受。’于是我们大大咧咧地到了重光那儿。重光说：‘实在没办法。如果你们觉得闲而无事的话，就帮我收集一些军事上的情报吧。’

我一回来，就完全与那些事无关了。过了一段时间，内阁交替，成立了铃木内阁，东乡当了外相，于是我成了大东亚省的次官。”

部员们心思浮动

田尻爱义氏继续说：“虽作了大东亚省次官，但也没干什么。在这敷衍时日的日子里，1945年5月25日发生了大轰炸。大东亚省虽幸运地躲过了被毁的厄运，但当时机关处于危急之中，所以接收了在中目黑的美国学校（现在是人身保险公司的总部），并把大部分机构迁移了过去。这时大东亚省的主要工作就是想设法向大东亚各地输送军需品，至少在这上面花了一半的精力。但是，

自5月25日的大轰炸以来，部员们显然都心思浮动了。

大东亚省的职员们，原来都是从各省集中起来的优秀人材。战局一不利，首先想到的就是回到原来的省里去，说是回去后可以干些正经事。因为这个机关并没干原来所说的工作，这么说也许是有道理的。于是，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在6月初的一天，我将主要的职员都集中在讲堂，说了以下意思的话：‘战争的前途已经很清楚了。大家都为战争的胜利而努力，大东亚省也是具有这种作用的机关，可是，再怎么努力，看来也是徒劳的了。虽然原来的工作不能放弃，但这用一部分力量就可以干了。所以，能否用我们的余力去研究怎么实现战后的复兴这一问题？正好我们这个机关从各省集中了许多有才能的专家，所以是否能举全省之力设立一个研究机构？’

可是，在那个时期，考虑战败后之一类的事情，如果被宪兵听见是不得了的；况且，这个省的大臣是由东乡外相兼任的，这个省的事，东乡可以随意干涉，所以我没法应承。于是，许多人说：‘诚如次官所言，所以我们想回原省，回原省去干这些事。’

有一位叫大来佐武郎的，在哪一部局工作忘了，现在经济问题上很著名，他原来是电工，记得他专门研究科学对战斗力的提高问题。他此时跑来对我说：‘战争失败后，我国如此狭窄的领土必须负载如此多的人口，经济的结构与类型也许要变。那时日本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也许要依靠海外。我们必须从现在就研究这一问题，我希望无论如何能让我来干这件事。’当时的杉原荒太总务局长，也积极地支持他的意见。他们选了各种人材、集中了各省的有关人员及财界、学界的人们，成立了委员会。但终战出乎意料地很快实现了。战争一结束，大东亚省就要被撤销，我也将被免职。所以我叫来大来君，拜托他说：‘此项研究正因为终战的实现而更加必要了。希望你从现在起，作为干事继续这一工作。’但我们不知外务省今后对此研究的态度，不知是否能从外务省取得继续研究的资金。我想，这是我最后一项工作了，就从当

时的大东亚省次官的秘密费中，支出三万或五万元交给了他。

此后，我因为机关被取消而赋闲。10月，币原内阁成立，吉田茂先生任外相，我又回到了外务省，这次被任命为政务局长。年底，美国提出了鲍莱赔偿案。鲍莱是盟军赔偿委员会的头目，11月13日，他以杜鲁门总统的个人大使的资格来到日本，对日本的经济能力作了调查，认为能从日本取得这些赔偿，而提出了这一方案。但是，这些赔偿似乎要求过高了，无法完成。我想起了杉原君和大来君组成的委员会。这时大来君已到外务省，于是我马上把他叫来，询问他研究的情况：‘那项研究的情况怎么样了？’‘大体上差不多了。’他回答。‘那太好了。请以那个研究材料为依据，对鲍莱的赔偿案，从数字上进行批评！’他说，须把要点译成英语，所以不能马上弄好，请给他十天时间。我对他说：‘现在已是刻不容缓了。如果就这样对鲍莱案置之不管，那是不行的。《波茨坦公告》上也写着要保障我国起码的经济。如果完全接受鲍莱案，能否保障就成疑问了。所以，我们必须首先抨击鲍莱案。这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关键，请在一周左右时间搞好。’

大来君很出色地把这件事干好了。研究分总论和分论，总论一译成英文就送给最高司令部，由后来任驻美大使的朝海浩一郎同最高司令部交涉，最高司令部见了这文件后，认为很有意思。他们进驻日本后，虽然作了各方面的调查，但数字性的材料几乎都被烧掉了。由于我们在终战前对此作了认真调查，所以在当时是贵重的资料。‘后面如何？’最高司令部频频催促。‘尚未译完。’‘请快一点。’

于是，记得就用铅笔书写，也没用打字机誊稿，每译完一张，就立即送到最高司令部。也许是自我吹嘘，这一研究起到了缓和对方赔偿要求的作用，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据说，后来在大来君的研究之外，通产省也提供了一份资料，两省同时起了作用。但是，无论如何，这一研究确实成为以后成立的经济规划厅，制定各种政策的依据。”

对华政策的再检讨

现在我们来听听当时的大东亚省总务局长杉原荒太氏（以后是参议院议员、自民党人）的谈话：“我作为外交官，专业是中国问题。在开战前夕，我担任南京总领事。但是，大约到了1941年12月，东乡外相指示我迅速回国。乘飞机回到东京，已是开战前的12月7日了。我立即赶赴东乡先生处，东乡先生说明天就要对英美开战了，所以要我从事有关战争的工作。头衔是调查部第一课长，并成为外务省出席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以后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代表之一。做这些工作不到一年，1942年11月1日大东亚省成立，我调到了大东亚省。要说这是个什么时期，可以说从初战攻击珍珠港以来，向南方地区进军的行动很顺利、暂时确立了我国在军事上的优势的时期。但是，后来不行了。军方也开始痛感，光靠军事是不成的，所以要成立大东亚省。但东乡外相表示反对。反对的理由之一，是已有了外务省，又成立一个同样的机关，就叠床架屋了。再有一个理由，是大东亚省一成立，人们看起来南方各地似乎就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即给人以殖民地省的印象。虽然东乡外相反对，但东条先生一意孤行。这是东乡先生离开东条内阁的原因之一。其实，我和东乡先生也是同样的意见，所以，要我去大东亚省的时候，我不愿离开外务省，以至回到了自己的家里。第一任大东亚省大臣是青木一男先生，他打电话对我说：‘希望你无论如何要来。因为我就任大东亚大臣的条件，就是以要外务省的你和大藏省爱宕一君来大东亚省，你不来就不好办了。’

后来得知，青木所以要我，是因为在南京汪政府成立时，青木曾任最高顾问，那时，由于我是南京总领事，常常在会议上见面，就是因为这层关系。但在当时我不知此内情，而且又不情愿，以至次官松本俊一君特意跑到我家对我说：这虽非命令，但是请

你去。所以最终我还是干了。松本君在那以前是条约局长，随着大东亚省的成立，涉及到一系列的人事问题，而被任命为外务次官，以后出任大使，终战时仍作为次官回到外务省。

这样，我来到了大东亚省。先任总务局总务课长，工作与外务省时期差不多，作为大东亚省代表出席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由于这一原因，约一个月之后，我自认为做了一件大事。这在大本营参谋、战争指导班长种村佐孝大佐在战后写的《大本营机密日记》中，也有详细的记载，就是制定了《中国事变处理方针的大转变》的计划。简单地说，当时的‘中国事变’的军事方面已完全陷入僵局。我们在中国时就痛感要从政治方面着手打开局面，但军方怎么也不同意。

当时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田中新一中将，他曾当面大声训斥东条是混蛋，我觉得他是不平常的人物，他命令种村君重新研讨对外政策。我是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又常常出席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与种村君等在工作上的联系较密切，所以他到我这儿来，要我帮他制定具体的计划。

我是很卖力的。为了每天集中精力研究对华政策的问题，住在帝国饭店近一个月未回家，竭尽全力制定这一计划。我的体格是较健壮的，但有一天晚上我去洗澡，突然发现腿上的肉瘦了许多。我感到吃惊，但我确实是如此地尽力，不是夸张，为此工作我甚至死也无憾。啊，那时大家虽然都在认真地从事各项工作，而我觉得这件事才算是大东亚省的事务。

然而，军方之所以抛弃过去的基本方针，决心实行对华新政策，与瓜达尔卡纳尔战斗有关。这是后来从种村君那里得知的。就是说，从初战的珍珠港到瓜达尔卡纳尔之战，军事行动都很顺利，但从别的角度看，日本的军事力量已发挥到极限。正在这当口，美军开始反击了，对瓜达尔卡纳尔反击是第一次打击。由此可见，如果再坚持过去的政策，以后将如决河之势，所以，不得不后退。这与为了从政治上稳定占领地，因而成立大东亚省也是

有关的。

据种树君说，参谋本部在1942年夏秋之际，决定进行对重庆的作战、以图一举解决中国事变，9月间曾对中国派遣军发出了命令。但是，以瓜达尔卡纳尔岛战斗的失败为开端，西南太平洋方面的战局非常危急，不得不急调在中国的三个师团，转用于新几内亚方面。重庆作战因此而流产。

这里谈一点题外话。参谋本部的田中第一部长骂东条是混蛋的插曲，就发生在瓜岛作战期间。为确保瓜岛，当时派了救援船，但船在途中接连地被美国空军击沉了。日本高速度的先进的船只，大半就是在这个时期丧失的。为弥补这一损失，参谋本部向陆军省提出征用37万吨船，对此，陆军省认为，现在的急务是从整体上提高国力和战斗力，如果征用如此大量的船只作战，将冲击民需，妨碍国力的增强。在要停止那个战役的气氛中，最后，参谋本部的田道次长和田中第一部长去东条的家中去谈判，终于吵了起来。

田中作战部长断定，不仅是进攻重庆的战役，就是整个战争时期，也不可能有用军事解决中国事变的途径。所以，此后要抛弃过去的方法，须一心一意地依靠政治策略。战争胜利了，以后什么都好说；战争失败了，从中国方面什么权利也得不到。要完成战争，关键是要把四亿中国人的人心吸引到我方来。于是，就令种村君研究具体方案。种田君在他的书中这么写道：‘大东亚省的杉原荒太氏对此全面赞同，于是把全部的准备工作的委托给杉原氏，以杉原氏为首的大东亚省的人们开始了非凡的工作。’

说‘非凡’使人感到不好意思，但我确实尽了努力。”

提出归还租界

杉原氏们苦心制定的《为完成大东亚战争所需要的处理对外问题的根本方针》，有以下的内容：

第一、方针

一、帝国以促使国民政府(即汪政权,下同)参战为打开日华局面的一大转机,根据日华提携的根本方针,致力于强化国民政府的政治能力,并设法消除重庆抗日之根据与名义,真正地更新的中国协力一致,向完成战争的方向迈进。

二、观照世界战局的演变,力求在美英方面的反攻达到高潮以前,使各项对华措施取得成效。

第二、要领

一、关于强化国民政府的政治能力。帝国尽量避免对国民政府的干涉,促进其自主活动;废除在华的租界和治外法权(香港、九龙除外),在适当时候对日华基本条约及附属秘密协约作必要修改。

二、经济政策。着眼于更多地获取物质。要有效地利用中国方面官民的责任心和创造性。

三、对重庆的方策。对重庆停止一切和平工作。

“在制定这一对华新政策中,我最注意并竭力主张的即‘要领一’,尤其是中方所谓的修改不平等条约的问题。当时各发达国家在华都有租界与治外法权。虽在中国,然中国在租界内却无法权,外国人干了坏事中国也无权审判。这确是不平等条约造成的典型,是中国人最大的耻辱。所以我提出首先要废除治外法权,并归还租界。

现在看起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当时美英也没这么做,帮助蒋介石与日作战的这些国家都没这么做。开战之后,这些国家的租界皆已被日占领,敌国人员的活动也受到了限制,也许可以说实际上已不存在此问题;然而,哪怕在形式上,美英也未对蒋介石声明不再占有租界,装着没这回事似的。我想,虽然日本率先这么做是以南京政府为对象,但能让中国人知道是日本第一个废除治外法权和归还租界也是好的。由于战争是那样的结果,所以历史上对此视若无睹,但我想,事实总归是事实。

这个新措施，首先是对长期以来不被世界列强重视的中国，在政治上的最大限度的承认，目的是帮助汪政府并促使重庆政府对此有所反映。结果却没达到预期的目的。这是因为为时已晚，没有充裕的时间使它产生作用，再早些就好了。但是，中国事变本身，就是因为日本不能正确认识中国，而发生的不幸事件，现在发牢骚已无用了。不管怎么说，在决定对华新政策时，青木大臣曾向陛下上奏，陛下很高兴地认可了；枢密院议长原嘉道也很赞成——这是我直接从青木那儿听说的。

那以后，缅甸独立、大东亚会议等也是我们的工作。大东亚会议宣言就是我起草的。在做那些工作时，常和军人在一起，但他们从不透露有关作战机密的事，但我们已明白战局很不妙。尤其是1944年2月，美国机动部队对马里亚纳群岛的大空袭，使我国海军航空队和舰船受到了很大的损失。那时虽还在挣扎，仍在自我安慰，但马里亚纳以后，我知道已不行了。那以后，我开始思考日本战败后怎么办的问题，但这也是白想，因为这取决于战争对立国的态度。于是我突然想到了战争赔偿的问题。

战争失败了，当然会有赔偿的问题。但赔偿过重，又是承受不了的，因为这会使得日本在经济上不能生存。如果不认识这一点，那就是日本的毁灭。所以，对我们来说，现在就对赔偿问题进行研究是必要的。如前所述，大东亚省的工作就是关于大东亚地域的政治性政策的设计，以及大东亚地域与日本如何进行物资交流的问题，因此，由大东亚省来研究日本的经济构成是顺理成章的。我觉得，这不仅是理论问题，更主要的是要从实际数字上着手。

大约在冲绳战之际，大来佐武郎君跑来对我说，希望能研究一下战后的问题。当时大来在经济课的爱知揆一君手下工作，因工作关系，而与他较熟悉。我感到他是有前途的人。本来，由大东亚省主持的大东亚地区的物资交流计划，大多是由原来从大藏省来的人承当的；大来虽是递信省出身的工程师，他干事极努力，

与大藏省来的同事一起从事着同样的经济工作。也许是工程师的缘故，他的构思最具实证性和计划性、很严谨。所以，当大来表明了要研究战后问题的愿望时，我鼓励他说：‘这很好，太有必要了’；还得到了田尻次官的赞成。当然，仅靠我们几个人是不行的，需要集中财界和学界的委员。经多次邀集，有了大内兵卫先生，东畑精一先生等等，都是第一流的学者。

与大来一起作委员会干事的后藤誉之助君也是不能忘记的。大来、后藤似兄弟般地配合得很融洽，先生们也认真地协力工作。但是，正当这个研究会出台时，终战已实现，这样，大东亚省被解散，原来从各省调到大东亚省的人，也都回到了原省。我也回到外务省当了调查局长。大来不愿回到原来的递信省，我就带他到外务省的调查第三课工作，做外务事务官。过去我在外务省时就悄悄地想过，将来若让我当经济局长的话，我是能够愉快胜任的。

回到外务省后，大来、后藤继续互相配合研究这一问题。后来，这些系统的意见，起到了驳斥鲍莱赔偿案的作用。据说美方公文认为这些材料是‘客观的并妥当的’。确实如此，因为这是当时的一流学者参加拟定的……”。

从满洲运粮食

现在我们把注意力转向这一问题的主人公大来佐武郎氏(当时是大东亚省的经济课技官)的谈话：“我现在被认为是经济学家，但我原先是技师。我毕业于东京大学工学系的电气工学专业。1937年入递信省的电气局。不到两年又到了兴亚院，在1939年6月调往了在北京的兴亚院华北联络部。这是因为我的父亲修治，在大连开办辽东新闻社，而我也是在大连出生的，并在那儿生活到小学时期。父亲是从1922年开始到中国大陆各地去的，据说曾会见过孙文。所以，我对大陆问题多少有些关心，让我到北京去当然是

很高兴的。

在北京，有位叫中江丑吉的老人，是位隐居的学者，似乎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他集合了一批年轻人，举办了读书会之类的活动，我也参加学习。中江老人说，近代的人应该通过对古代史的比较，预先研究‘战后的亚洲’和‘战后的世界’。中江老人的这一观点，对年轻的我有强烈的影响，但那时我尚未作这方面的考虑。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我很快地在1942年初开始思考此问题。这时，我奉召回国，在兴亚院的技术部工作。兴亚院其实就是于1942年11月成立的大东亚省的前身。我调到这个新机关的调查课工作，直到终战前的两、三个月调到经济课，才得以专心致志地从事这项重要工作。

终战时期的大东亚省，大臣是东乡外相兼任的，由于他很少到大东亚省，所以由次官主持。次官是田尻爱义君，总务局长是杉原荒太君，其下，总务课长是山田久就君，经济课长是爱知揆一君，调查课长是后来任农林次官的盐见友之助君。对了，终战时我在经济课，与我办公桌相邻的是以后的国铁总裁矶崎睿君。过去兴亚院的工作是关于中国占领区的行政设计，成立大东亚省之后范围扩大了，包括了整个亚洲，与此有关的工作全部归属大东亚省负责。

如果问我在大东亚省干了什么工作，因为我是工程师，在调查课的初期，是大东亚技术委员会的干事，可说是从技术方面来观察大东亚的问题的。我主要负责电力问题，也进行了为使日本与大东亚各国的技术交流顺利进行，而实行技术规格的统一等工作。但是，以后扩展到整个工业问题，如对铁矿和铝矿资源的调查。

有这样一件事，那是在终战的1945年的2月，我曾整理了一份题为《关于本邦经济对大陆资源的依存状况及今后大陆物资对日供给方针》的晦涩冗长的报告。那时，就海上运输的实情看，除

依靠大陆资源外，别无他法。因此，调查了日本钢铁生产对朝鲜、满洲和华北的依赖程度。于是发现，在1944年下半年从大陆运往日本的资源中，70%以上是铁矿石、煤、铸铁、氧化镁等炼铁原料。但是，应设想到今年，即1945年的下半年，大陆与日本的运输几乎断绝的情况。所以我研究那些是在运输断绝之前必须运输的物资？当然，就迄今为止的实绩而言，决定须优先考虑炼铁原料，但如果想方设法挖掘国内资源也不见得就必须如此，铁类物资实在无法时，可以拆掉铁轨，而粮食则具有决定的意义了。所以我的结论是，比起炼铁原料来，宜先从华北和满洲抢运盐和大豆。于是我起草了这份报告书，并送到陆军省、海军省、情报局(当时的情报局总裁是绪方竹虎君)进行游说。

乍一看，我的想法似乎很特别，然而陆军采纳了我的意见，特别是同意在紧急时刻拆除铁轨，也能满足铁的需要观点。陆军一心准备本土决战，所以比谁都认真。要进行本土决战，无论如何是需要粮食的，在终战前半年左右的时间里，甚至动员了登陆艇从满洲把大豆和食盐运到了以新潟为中心的日本内地(当时实地指挥此工作的是安井藤治和左近司政三两位国务大臣)。听说抢运了80万吨大豆和26万吨食盐，以至由于国内运输的问题，而长期在港口大量堆积，但这对摆脱终战不久的粮食困难，起了很大的作用。也许我那时，对后来的情况有预感，并经过了考虑。虽然做了这件事，但就从物资流动这点上看，就明白了战争很难有胜利的可能。

与此相关，在很早以前，当我大学毕业到递信省工作了两年左右时，即太平洋战争尚未开始之际，我希望能学一些自己的电气专业以外的东西。当时，我依据新闻广告到了一个叫‘昭和塾’的所在，时间虽短，却使我开始入门。这是近卫先生的智囊们的昭和研究会，由九州帝大教授、朝日新闻的记者佐佐弘雄先生等任讲师，他们指出：‘如果日本继续目前的状况，必将失去台湾和朝鲜！’那时，我对此还不太明白，但奇怪的是这话总萦回在我的

头脑中。那以后，我到了北京，那个中江老人也如此说，这就给我留下了极强烈的印象。我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太平洋战争刚开始不到半年，不知是什么机会，我曾调查了日本铁的生产状况，于是发现铁的生产急剧下降，具体的数字已记不起来了，但使得我十分担忧，战争都开始了，铁的生产却落了下来，这个战争是很难操胜券的。我拉了兴亚院的两、三个同事，一起到风见章的家里去。风见先生是位在近卫内阁中任书记官长的名人，他是我父亲的密友，也是我结婚的介绍人，所以是很熟悉的。我去到风见先生那里，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日本的生产力自1941年下半年以来急剧下降。内阁中枢的人们明明十分了解，为什么还要开战？这场战争是输定了，所以唯望近卫先生想方设法收拾战局。’

这段话不单我记得，在风见章先生以后写的《近卫内阁》的书我也有记载，大约在253页。那本书中有接见企划院的大来佐武郎君等两、三个年轻官员来访的话。其实不是企划院，而是兴亚院，这是风见先生的记忆有误。可见，我很早就有败战必至的想法，所以，在尚未决定终战之时，就深入地思考战败后日本怎么办的问题。但是，当我向杉原总务局长和田尻次官提出这个意见时，年仅32岁，觉得很不好意思，也许这是年轻人的意气吧……。”

战后经济研究会

大来佐武郎氏继续说：“无论怎么想，也必然是战败必至。所以，我想从现在起就研究战败后的日本问题，我有这种想法是在我到经济课之前，大约是1945年的春天。我先是到平员藏先生的家中与其商量。平先生不是官员，是以前我去学习过的近卫先生的‘昭和塾’中的理事，即我的先生。他大约出生于山形县长井市，曾任法政大学的教授，写过关于大东亚问题的论文。当时他在东中野有家，和我的家很近，所以常去拜访。此时，平先生是石桥湛山先生的《东洋经济》报社的评议员，所以他与经济学者们交往

甚多。我对平先生说：‘战后的日本经济应该怎样，我想从现在就开始研究。’‘这很好。’平先生对此很赞成。

平先生大约每周去《东洋经济》报社一次，常常遇见大内兵卫先生（原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他对他谈起这件事，他也十分赞成，并且认为宜建立包括政府人员和学者在内的正式的委员会。于是汇集了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的各位先生。

这个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除大内先生外，有蜡山政道先生（原茶水女子大学校长）、杉村广藏先生（当时东京商大教授）、中山伊知郎先生（原一桥大学校长）、东畑精一先生（原东大名誉教授）等；同时，我也邀请了财界和技术界的人员，如石川一郎先生（原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龟山直人先生（原日本化学学会会长）、秋元真次郎先生（原农业技术协会理事）、大野数雄先生（原经济安定本部资源调查事务局长）、井上晴丸先生（原立命馆大学经济系主任）、巽良知先生（原资源协会专务理事）等。当然，此事也向总务局长杉原荒太谈了，得到他的大力鼓励，并让我使用运营费，一下子提供了50000日元。

但是，虽然如此，由于当时还在战争中，尤其陆军在大做本土决战的准备，所以关于建立战败后的经济问题的研究会的事，是不能公开的，一旦说出此事，那就会被宪兵队一网打尽。那么，用什么名义呢？经过斟酌，决定以‘在朝鲜海峡被封锁、大陆与日本完全断绝联系的情况下的日本经济自治问题’为研究的题目。这个题目虽然不是十分合适的，但战争失败后确实将是这种状况。确定举行委员会的程序，大概是在8月初。根据我手中留下的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书，审议事项有如下方面：

- 一、有关目前外交措施的事项
- 二、将来使日本民族自治的对策
- 三、与大东亚区域的关系
- 四、今后的审议方法

第一次会议决定于1945年8月16日，在大东亚省总务局长室召

开。非常凑巧，会议前一天的15日，已实现了终战。但在送通知时尚未终战，所以审议事项显得无条理。现在既然已经终战了，就无所顾忌了，诸位先生的发言，因此而更加热烈，也十分认真。

但是，战争一结束，大东亚省立即被解散。这事怎么办呢？这时，杉原先生要回到原来所在的外务省任调查局长，他对我说：‘你也一起去吧，在外务省继续此项研究好吗？’

于是我来到外务省的调查第三课，从这时起就成了外务事务官。这时，我们委员会的名称变为‘战后经济调查会’，委员人数也相应地扩大了。我虽是干事，但没有充裕的时间着手这一工作，偶尔去北京大使馆、或出差到东京迎接终战等，所以增加了赋闲中的后藤誉之助君和在农林省从事农业问题的并木正吉君为干事。以后增加的委员有：有泽广巳先生（原法大总长）、安芸皎一先生（原东大名誉教授）、稻叶秀三先生（原经济安定本部官房次长）、宇野弘藏先生（原东大教授）、岸本诚二郎先生（原东大名誉教授）、近藤康男先生（原东大名誉教授）、山中笃太郎先生（原一桥大学校长）、山田盛太郎先生（原东大名誉教授）、胁村义太郎先生（现学士院长）、都留重人先生（原经济安定本部综合调查委员会副委员长）等，全是一流的经济学家。

会议地点主要是在大东亚省被烧的大楼中举行，星期天就在神田的‘龟名屋’之类的旅馆举行。到1945年的11月底，平均每周二次，共计开了40次会议。即使在极冷的日子里，虽无火取暖，但仍从早到晚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终战时的大东亚省次官田尻爱义先生，在他将离任到外务省当政务局长时，又给我们的研究追加了50000到100000日元的运营费。当时的钱较值钱，难得的是还用这钱买了黑市的白米。关于这个会议的情况，大内先生和有泽先生在他们自撰的书中也有描述……”

在大内兵卫著的《经济五十年》下卷328页有：“（我）似乎是在胁村君的劝说下参加的，那时的中心人物是大来佐武郎君，这个

审议会的主要成员是公职人员，以后大约都加入了经济安定本部，是今日经济企划厅的智囊团。在战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常常出入于烧塌的满铁大厦，虽无火取暖，十分寒冷，却热烈地谈论着日本的将来，这情景是怎么也忘不了的。那时写成了大约名叫《日本经济再建的方策》的小册子，记得还有了增订版。这本小册子现在手边已没有了，但这是一本在日本经济学上值得纪念的小册子，因为那时的审议会，几乎动员了当时日本经济学的全部优秀学者。他们正如明治维新的志士，干劲十足地议论着日本的将来，可惜的是没有对以后日本的经济进行综合的讨论……”

在有泽广巳著的《学问、思想与人》一书的203页中有如下描述：“最初叫我到东京来的，是外务省调查第三课的战后经济调查会，这个组织是终战前夕设置的，几乎与终战同时开始正式调查。除中山伊知郎、宇野弘藏、山田盛太郎诸君外，集中了众多的学者。会议的议题是关于战后日本经济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会议的目标就是讨论这个基本方针，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问题。会议实际的主持者是大来佐武郎与后藤誉之助君，二位十分努力地整理着会议的议论，摘录其要点，并为下次的讨论做准备。问题虽多、议论也多有分歧，两君恰到好处地掌握着会议，使会议每回都有所进展。

随着会议的多次举行，出席者也有所增加，各省的主要官员似乎都出席了，而且都无拘束地谈了自己的意见，大家都很热心和认真。为了新生的日本经济的建设，为了集中大家的智慧，确立基本方针，都十分努力。虽然在粮食和取暖上条件极差，仍然在1945年底完成了报告书的草案。这一报告书是作为外务省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以《日本经济再建的方策》为题印刷刊行的。在终战后的空白时期里，促使着众多的政治与经济的学者及主要官员们思考日本经济建设的问题。我想，观察一下10年以后的现在的日本经济，与当时相比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那是十分有意思的事情……”

让我们重新回到大来佐武郎的谈话上来：“这个调查会的结

论，在终战那年年终被整理成为《日本经济再建的方策》的小册子，印了一万册左右，送给各个方面。其内容概而言之，就是要在过去不曾有过的广阔的视野上研究经济问题。正如以前的一个故事所说的，由于巴黎流行的妇女帽的装饰是鸟的羽毛，对鸟的羽毛需要的变化，影响着非洲当地居民的收入一样，对经济现象的理解、对经济政策的设计，不考虑世界背景是不行的。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对日本经济的实际情况没有明确的把握，因为，这既有世界上普遍的问题，也有日本特有的情况。所以有必要对两方面都进行分析，在‘普遍与特殊综合的基础上’，考虑今后的政策。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仅仅照搬欧美发达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套用于日本的情况，是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解答的。所以，这个报告书着重致力于说明日本经济的特殊性。

这个报告书从基本的地理条件、资源的多样性与量的贫困、过剩人口的存在、作为近代国家的后进性等，到产业构造、劳动条件、农业、工业、金融、地方财政等，细致地考察了日本的特殊性。并且，使人不能忘怀的是，正由于我们研究了日本的特殊性，所以当鲍莱赔偿使团来日本时，能据理进行反驳。关于赔偿问题，在第一次会议上大内兵卫先生就指出：‘首先，要研究赔偿的问题，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对此无所准备，就谈不上经济再建的计划。’

所以，我们首先研究了这一问题。我们调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赔偿问题，还查阅了美国的文献和资料，调查了美国关于日本赔偿的态度。一个时期在同盟国方面，有为了排除将来日本的军事危险、要完全摧毁日本的工业力量的强硬主张，但《波茨坦公告》则写着‘允许作为和平的生活水准方面的生产’。那么，什么是和平的生活水准，这就是首先所遇到的问题。经过多方面的调查，得到了华盛顿著名的经济调查机关‘布鲁金斯统计学’的学者摩尔敦的报告书，根据这一报告书，明白了所谓日本人的和平的生活水准是指满洲事变前夕、即1930年的生活水准。但是我

们不能拘泥于此，我们要计算能使日本经济存活的最低限度的工业力是什么？日本要生存下去，必须输入原料，必须输出工业制品；为恢复破坏了的经济需要投资，为此，明确地用数字说明了日本所需要的工业力的程度。

鲍莱最初提出的赔偿要求过于严酷。当初，占领日本的政策是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我们觉得，如果如鲍莱那样剥夺日本的工业力，则《波茨坦公告》所限制的和平的生活水准也不能保证。以此为出发点，我们作了研究，整理了《关于日本赔偿能力的研究》的论文，分送给鲍莱和GHQ。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改变了赔偿的态度，结果没有赔偿。

无论如何，我们所作的综合的《日本经济再建的方策》的研究，既有符合战后日本经济实际发展的方面，也必然有不相符合的方面，这是因为现实的政策取决于各种狭隘势力的对立和政治的、社会的诸种因素。但是，即使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我们的设想不同，但是，只要一国的社会不存在停滞与腐败，总体上总是在向着进步发达的方面前进的，我们确信这一点。并且，今后这种进步与发展，决不取决于少数人的权力，而必然依靠国民多数的理解。

现在想起来：当时我32岁，正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时期，忘我地努力工作着；而且，众多的先生们，正如大内先生所说的，以明治维新志士的气概，思考着日本的再建问题。与其说是怀念，还不如说要在整个生涯中都能有这种珍贵的热情……。”